

伪创新,闹剧式“表演”该收场了

本报评论员 杜鑫 吴迪

在舆论的论异和声讨中,彩礼贷、墓地贷不出意外地迅速被叫停,以闹剧收场——据近日《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3月18日,云南昆明一陵园推出“不需要抵押”的墓地按揭贷被叫停;同日,九江银行发布致歉声明,表示取消之前推出的彩礼贷,并对责任人给予处分。

彩礼贷、墓地贷,类似“奇葩贷”的合法合理性何在?金融产品创新的边界何在?公众对类似游走于法律边缘、有悖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奇葩贷”,纷纷表示不满与质疑。

彩礼贷、墓地贷,表面上看是银行拓宽消费贷应用场景、满足特定人群金融需求的创新,实质上则是典型的伪创新。

银保监会曾给出衡量金融创新合理性的基本标准——是否有利于支持实体经济、是否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是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照看,彩礼贷、墓地贷无疑谈不上支持实体经济,某种程度上会鼓励“天价彩礼”“天价墓”等不良风气,而过度营销则可能诱导消费者过度负债,不利于防范金融

风险。

类似伪创新的身影,近来不时出没于我们周边,包括某些以“高科技”名义,热炒伪概念。比如,在很多人还没搞清楚量子技术的时候,“量子护肤”“量子项链”“量子眼镜”等量子概念日用品充斥电商平台。很快,专家啪啪“打脸”这些商品:目前量子科技研究主要集中在量子通信、量子计算和量子精密测量等领域,应用到百姓生活可能还要数年之后。当下所谓“量子+生活”产品,几乎都是骗人的。

这些伪创新产品大多披着光鲜的外衣,针对特定消费群体的需求,精准下套。比如,借款、嫩肤、黑发是某些人群的刚需,在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庞大的消费者人群中,针对这些刚需上演的骗钱闹剧总会不时上演,而不幸的是,它们也总能找到一些“交学费”的人。

伪创新屡屡粉墨登场,根子在一些人“挣快钱”的思想作祟。相比真创新的高投入、耗时耗力,复制已有模式、稍加变通,或者炒作伪概念,投入更低、来钱更快。而监管的滞后

或缺失,也给了一些人钻空子的机会。

类似伪创新的闹剧,尽管只是活跃在个别领域或地方,总体规模和体量不算很大,但我们依然有必要警惕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以金融产品为例,贷款产品的创新理当守住底线和“良心”,不能折损淳朴的民俗民风和社会主流价值观。

打击伪创新、防止被忽悠,需要社会各界一道努力。监管要与时俱进,快速反应,正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确保金融创新在审慎监管的前提下进行”。此外,一旦发现类似闹剧上演,相关各方应配合监管部门,及时揭穿闹剧、骗局的真面目,规范相关市场秩序。

无论是金融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创新都应该得到鼓励,但创新必须坚守一个基本前提和价值取向——守正。无视社会效益的创新注定难以走远、走稳。与此同时,有必要强调,各方应该多给真正的创新提供展示的舞台,让创新背后的汗水被人们看到,让创新的价值得到最大化的实现。

“律所收20万元咨询费”,诸多疑问待解

李英锋

据中国新闻网3月21日报道,近日,网上关于“武汉一癌症患者欲卖房捐出遗产,10天被律所收20万元咨询费”的视频,引起关注。当地司法行政部门随即发布通报称,对此高度重视,将尽快完成案件调查,决不姑息违法违规行为,处理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癌症病人、卖房、捐赠、20万元律师咨询费……这些字眼直指律师只问“钱”景、不近人情,刺激着公众的神经。目前,当地司法行政部门已对此事展开调查,这当中有几个疑点显然需要解释清楚。

比如,双方是否自愿协商。根据我国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律师服务收费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实行市场调节,由律师事务所以与委托人协商确定。那么,涉事律所在收取咨询费之前,是否遵循了上述原则,是否与委托人进行了清楚地协商?

比如,律所收费是否合理。同样依据前述规定,律师服务收费应当考虑“耗费的工作时间”“法律事务的难易程度”等主要因素。如果网传内容属实——委托人罹患绝症,来日无多,而卖房牵涉的法律问题通常并不复杂。如此情况下,20万元的咨询费,合理合规性何在?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何在?

再如,双方是否签订了正式的委托合同?委托合同中的收费条款是否明确、具体?是否就收费标准、额度、项目等向委托人进行了充分的告知?

不管调查结果如何,这一事件都应该引起人们对时下一些律师、律所乱收费问题的关注和反思。律师从事有偿服务,收费赚钱实属正常,但不能一味钻到钱眼里,只有市场性而缺少了必要的公益性。

进而言之,律师向弱势群体违规收取天价服务费,不仅侵犯了委托人的合法权益,逾越了法律底线和社会公德底线,也背离了律师服务的初衷,更不利于律师行业的整体形象和健康发展。针对一些委托事项或弱势群体,律师酌情少收费,甚至启动法律援助不收费,更符合人们的期待和整个社会的价值追求。无论如何,乱收费、多收费、违规收费都应受到处罚,并且应该用来以儆效尤。



图说

安全第一

据《新京报》报道,近年来,快递、外卖在给市民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配送人员闯红灯、逆行也给城市交通安全带来严重隐患。日前,北京交警联合有关部门向8家知名物流和外卖平台企业发放“交通安全警示黄牌”,并召开对相关企业的集中约谈大会。

外卖小哥、快递员闯红灯、逆行现象早就饱受诟病,引发的交通事故更是呈现上升态势——据统计,2020年以来,北京市外卖即时配送电动自行车发生同等责任以上致人伤亡交通事故同比2019年事故起数、伤亡人数分别大幅增加。事实上,相关企业对于配送人员广泛存在交通违法行为并非不知情,有的企业也推出了类似“多等5分钟”等措施,但实际效果仍不乐观。此番相关部门联合约谈部分企业,甚至发出黄牌警告,本质上是在监管层面重申红线,警示相关企业务必将安全放在第一位。“安全是骑手最快的路”,有关平台对此不仅要有充分的认识,而且要有切实的后续行动。

李黎明/图 嘉湖/文

对医疗器械的监管关乎全民健康和生命

丰收

据《新华每日电讯》3月21日报道,新修订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将于今年6月1日起施行,日前,相关部门负责人在就条例的有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为完善企业法律责任,条例大幅提高了罚款幅度。特别是对涉及质量安全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货值金额30倍的罚款。

医疗器械在疾病的预防、诊断、监护、治疗、缓解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质量关乎患者健康和生命安全。2000年,我国《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并于2014年进行了首次全面修订。此次根据医疗器械审批改革及新变化、新问题,进行的第二次全面修订,亮点颇多。

比如,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条例专门做了5方面的制度安排,包括优先审评审批制度、附条件批准制度、紧急使用制

度、临床急需特批进口制度等。如此安排应该是吸取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经验,同时为未来应对可能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准备了一整套更高效、实用的制度体系。

再如,在提高违法成本方面,条例作了三方面修改:大幅提高罚款幅度;加大行业和市场禁入处罚力度;增加“处罚到人”的规定。这些变化无疑大大增强了震慑力,使医疗器械生产、经营等环节的责任人不敢轻易触碰法律“红线”,这对于保障公众健康和企业公平竞争有重要作用。

从现实情况来看,近年来,有关医疗器械的消费投诉增长不少。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的《2020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显示,在2020年商品细分领域前十位消费投诉热点中,医疗器械位列前五,受2020年疫情影响,医疗器械投诉相比2019年增长了十几倍。

而被投诉的主要问题是价格和质量。就质量问题而言,部分医疗机构或企业存在使

用过期医疗器械、销售假冒防护口罩、经营无合格证明文件的医疗器械等。解决这些公众健康的隐患,既需要有关方面依法查处,也需要通过完善制度提高违法成本。从这个角度看,此次修订条例提高处罚力度及时且必要。

尤其是,对涉及质量安全的违法行为,最高可处以货值金额30倍的罚款。无论是“最高可处以30倍罚款”本身的威慑力,还是收到这种罚单的典型案例,都能对其他医疗器械的生产者、经营者、采购者起到足够警示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条例的规定,保障医疗器械质量安全还需要其他环节、相关制度和措施的配合。据悉,今年国家药监局将修订医疗器械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经营监督管理办法以及使用质量监督管理办法,这意味着对相关行为的规范和监督将更加精准和细化。

医疗器械的质量如何,是一个关乎健康中国的大问题。期待堪称“史上最严”的处罚和规范,能够不打折扣地落地,能够护航更多人的健康和生命。

养老保险在上海、福建和江苏苏州试点两年后,累计参保人数为4.76万人。

如此“叫好不叫座”,很大程度上在于试点政策的吸引力不足,推出的养老产品未能告知明确的回报等,还有人担心“投资跑不赢CPI”,进而没有参加的热情和动力。

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本质是个人利用金融手段增加养老资本积累的一种方式。目前,市场上养老类金融产品繁多,哪些属于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仍需进一步界定和明确。

尤为重要的是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受众较广,因而在顶层制度设计时应通盘考虑、统筹兼顾,既要有激励性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又要有可预期的投资回报。只有当制度基本健全、政策足够优惠、未来可以预期时,个人才能减少后顾之忧,愿意为养老投资。

此外,鼓励发展个人养老金,还要转变人们固有的养老观念。从国家一手包办到有前瞻性主动规划养老,从储蓄养老到投资养老,不是朝夕之间就能完成的事情,需要方方面面的统筹推进、齐心协力,也需要循序渐进、科学、精准施策。



“神医”进驻短视频,“演技”爆棚蒙住了谁?

龚先生



“神医宇宙”电视广告被曝光后,由演员扮演医生“带货”相关产品的广告,悄然进驻短视频平台。

视频有一定的科普服务性质;不直接在平台上交易;一些出境医生确实有真实从医资格——这些都让短视频平台上的医疗保健广告更加隐蔽,监管触角很难

进一步深入。平台一旦成为违法违规医药广告的“帮凶”,对消费者权益、公众健康乃至医药行业正常秩序来说,无疑都会埋下不少隐患。

是时候认真监管了,让“有啥说啥、是谁就谁”成为商品和服务类广告的底线,让“神医”无处流窜。

网友跟帖——

@夏夜空:最应该整治的是平台。
@飞儿虫:说的话都一模一样,太尬了。



阅读全文请扫码
“工人日报e网评”

农田里“长”出健身器,基层形式主义新注脚

老鹰

据山东电视台报道,在山东莱西市院上镇,十几种健身器材被围栏圈在一处田地里,大门紧锁无法进入。记者走近发现,这些健身器材上标有“中国体育彩票捐赠”字样,几乎没有使用痕迹。据实地测量,健身器材安装的地方距离最近的村子有1.6公里,周边全是农田。山东省体育局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建不如不建,有不如没有。

毫无疑问,健身器材应该建在居民生活区,方便居民随时就近锻炼。如今,健身器材安装在1.6公里外的农田里,使用起来显然不怎么方便,何况相关地方还是“大门紧锁”。

健身器材标有“中国体育彩票捐赠”的字样,不言而喻,是由体育彩票资金买单的,当健身器材远离居民、使用率低,某种角度上也是对资金的浪费。这不符合彩票公益金使用和管理的精神,没有体现出其社会价值。从现场照片来看,这些健身器材还有侵占农田甚至违反土地管理法的嫌疑。

农田“长”出健身器材更像是一种形式主义。随着健康中国行动计划的推进,我国针对农村地区实施了“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这是提升农村居民健康水平的民生工程。上述村镇在农田里安装体育设施,表面看是对相关精神和要求的一种落实,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摆设,形式上为农民提供了健身设施,实际上农民想用却用不到。

通常来说,从当地体育管理部门到镇政府,都应该从便民利民的角度指导、监督这些体育器材的合理安装和使用。但镇政府工作人员说,对于村里的行为不清楚;而当地体育中心工作人士表示,每年安装的器材太多,所以一般都不跟进;具体负责安装的村组织更表示对此不负责……如此也便不难理解事情何以至此。

对于农田里“长”出的健身器材,有关方面应该彻查,该整改的整改,该问责的问责,给公众一个交代。更要警惕的是,类似情况是否在其他地方也存在?是否仅限于健身器材?对基层存在的形式主义歪风,要自查自纠,更要举一反三,以绝后患。

媒体声音

◇市长向企业道歉,政商关系应有的样子

近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长在招商引资大会上向与会企业诚恳致歉,并深鞠一躬,郑重表示一定不再承诺“空头支票”。

《中国青年报》评论说,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有些地方政府明知不能履约,还会搬出各种借口,让企业成为被动一方。这种凭借政企不对等地位得来的“便宜”,是以本地营商环境恶化为代价的。像呼市一样,不找借口、不逃避责任,由市长出面做出诚恳的道歉,设法尽快落实承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商标抢注到英烈头上!脸都不要了?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句战斗口号,是陈祥榕烈士生前写下的,近日针对以“清澈的爱”为内容的商标注册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法驳回,并予以公布、谴责。

人民日报评论微信公众号评论说,恶意抢注抢到了英烈头上,不仅突破了道德底线,更违反了相关法律,是唯利是图和流量至上的思维在作祟,必须更正和纠偏。眼中只有利益没有道义,把蹭流量当作经营秘籍,这样的企业也注定走不远。创建良好的商标事业生态,还需形成打击恶意注册的强大合力,助力提升我国知识产权的法治水平。

◇申请硕士学位不用发论文,还需更多大学“进群”

日前,清华大学公布了规定,明确不把发表学术论文作为申请学位论文答辩或申请硕士学位的前置条件。

澎湃新闻网评论说,不硬性要求研究生毕业发论文,既是落实破除“唯论文”,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要求,也是推进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要求,意味着高校要将考察方向,从肉眼可见的论文数量转向学生的实际学术水平、学术能力。期待更多高校跟上,用改革倒逼学术评价体系的优化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乐群整理)

用可期的制度设计赋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李丹青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引发各界持续关注和讨论。

所谓第三支柱养老保险不同于为养老存钱,指的是个人为养老投资,通过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等金融产品,建立起个人养老金。

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包括“三支柱”。除了体现个人责任的第三支柱,还有政府主导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即人们常说的养老金;用人单位主导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目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健全,覆盖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近10亿人。如

此背景下,为何还要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实际上,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的功能定位犹如它的名字一样,“保基本”。当前,我国退休职工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基本养老保险,但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比例的平均不超过45%,保障水平相较于退休前的工资收入有不小的差距。

要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确保退休后的生活水平不降低,仅有基本养老保险有时并不足够,还需要企业(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来提高养老待遇。考虑到老龄化、社保政策调整使得第一支柱承压加大,而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发展缓慢,推进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建设实属必须。

事实上,从“以房养老”到个人税收递延

型商业养老保险,我国在构筑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方面已有尝试和探索。

具体来看,“以房养老”是将房产抵押给保险机构后老人可继续居住,并按月从保险公司处领养老金;而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是指,投保人可在税前扣除保费,等到退休后领取这部分养老金时再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照政策设计的初衷,参加这些计划有利于增加个人养老积累,拓展保险业务、缓解养老资金压力,对投保人、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而言,可谓“三赢”。

然而,从市场效果来看,这两类产品似乎都面临着前景看好、推进困难不小的尴尬——较早开展“以房养老”试点的保险公司,5年间承保不足200单;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